

# 新闻媒体眼中的华人移民形象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华人

陆伟芳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英国; 华人移民; 新闻媒体

[摘要] 直到20世纪中叶, 在英华人数量并不很多, 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威尔士的华人移民倍受歧视, 尤其是新闻媒体在报导华人时有一种妖魔化倾向, 华人成为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英国人夹杂着种族偏见的一种心理渲泄对象。本文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初步探讨。

[中图分类号] D634. 356.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5162 (2002) 02- 0048- 06

## The British Chinese Image in the Press in the 19-20th Centuries

LU Wei 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British Chinese; migrants; press; prejudic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migrants in Britain, their particular experience, suffering and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home society during the 19-20th centuries. The British media expressed special prejudice to Chinese immigrants, even tried to uglify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various ways. It is found that the British Chinese actually became a target of discrimination whenever there was an economic depression.

“你知, 我知, 他们知道, 华人根本不配是个海员, 他的唯一长处是廉价。”1911年的《卡迪夫海员评论》<sup>[1]</sup> (Cardiff Maritime Review) 如此断然宣称道, 它典型地反映了英国新闻媒体对华人的歧视态度。本文拟就威尔士新闻媒体对当地华人情况的报道作一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探讨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眼中的华人移民形象。

—

学者们大都认为, 华人海员大约于19世纪晚期出现在英国。早在1834年, 东印度公司就丧失了其在华贸易垄断权, 英国的其他贸易公司和航运公司得以插足对华贸易。<sup>[2]</sup> 鸦片战争后, 英国大量工业品向中国大陆倾销, 中国丝、茶行销欧洲, 1850年, 大英轮船公司 (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 的玛丽·伍德号首次驶入上海黄浦江, 开始了上海—伦敦定期航班,<sup>[3]</sup> 1865年, 利物浦船主阿尔弗雷德·豪特 (Alfred Holt) 和菲列浦·豪特 (Philip Holt) 兄弟的海洋轮

[收稿日期] 2001-11-19

[作者简介] 陆伟芳 (1963-), 女, 江苏常熟人, 副教授,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经济和社会史。

船公司公司 (Ocean Steamship Co.) —— 这家公司的船只都有引人注目的蓝色烟囱, 因而得名“蓝烟囱” (Blue Funnel Line) —— 的“鸭加门号”停靠在黄浦江边, 在 1868 年开出第一条中英直接贸易汽轮, 并从 1893 年起雇用华人海员。<sup>[4]</sup> 1870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 1871 年上海与伦敦海底电缆铺设完成, 此后, 一些轮船公司都不定期地派大型轮船往来于上海和英国之间。<sup>[5]</sup> 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 吃苦耐劳的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可资雇用的人力资源。

据英国人口调查资料显示, 1901 年在英国居民中有 387 个华人; 到 1911 年增加到 1319 人, 其中海员为 480 人<sup>[6]</sup> (包括航运部 94 人, 机械部 292 人, 厨师、服务员和其他职业 94 人)。<sup>[7]</sup> 一战以后英国颁布移民法, 给华人移民设置重重障碍, 华人数量增加缓慢, 所以, 直到 1930 年, 利物浦的华人数目只增加了 27 人, 且包括在英国出生的华人后裔。直到二战爆发, 英国大批青壮劳动力服役从军, 劳动力顿感缺乏, 再加上中英是反法西斯同盟国, 因而大批华人出现在英国。例如在 1939- 1945 年间, 利物浦就组织过华人海员后援队, 征聘了大批华人海员, 为战争服务。不过, 由于朝野上下对华人的歧视, 直到 20 世纪中叶, 华人数量在英国始终不多。

在威尔士, 华人大多集中在南部的卡迪夫等港口城市。19 世纪下半叶, 威尔士南部的煤炭工业十分发达, 因此, 象卡迪夫、新港 (Newport) 和巴立 (Barry) 等港口都因之而繁荣。世纪之交, 卡迪夫煤炭出口量居世界首位, 从 1870- 1914 年, 它占全英煤炭出口量的 82%,<sup>[8]</sup> 出口货物的吨位仅次于伦敦, 成为全英最大的不定期货运出口港。由于出航货船多, 需要雇用的海员数量多, 卡迪夫就象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海员们, 囊空如洗的海员纷纷前来寻找受聘机会。因此在卡迪夫时常聚集着大量海员, 为海员服务的寄宿公寓应运而生, 其中也不乏华人经营者。

从职业结构来看, 海员职业构成华人队伍的大部分。华人海员来往于中英各港口之间, 不久便在各港口出现为华人水手服务的店铺, 主要是寄宿公寓。这些华人的生计都与港口息息相关。而已经定居下来的一些华人则转而经营手工洗衣业。如果说海员们主要聚居在港口周围的话, 那么, 洗衣店的开设, 则使华人居住区在城市里分散开来。自 1901 年首家洗衣店在伦敦开业, 到 1907 年时, 卡迪夫大约有 30 家左右华人洗衣店, 利物浦有 49 家, 1931 年时全英已有 500 多家这类洗衣店。<sup>[9]</sup> 直到 50 年代中叶大批华人转为经营餐饮业为止, 华人在威尔士乃至英国基本上都局限于航海业和洗衣业这两个职业领域, 它们都是劳动强度大而收入不高的“低等”职业。

## 二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黄种人的出现, 与黝黑的非洲人的出现一样使人侧目。他们独特的外表和奇异的生活方式成为嘲笑和攻击的对象。

西方人带有偏见地看待所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问题。据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与一对孪生“罪恶”——吸鸦片和赌博联系在一起的。例如 1906 年 12 月的《南威尔士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为“J·B”的人的来信, 警告“小殖民地”早已在卡迪夫壮大起来。声称这些华人都是孤身在外, 没有家属陪同, 在利物浦这已经降低了其居住区的道德水准, (有朝一日) 在卡迪夫也会发生同样的事。“J·B”的意见决非是个别的, 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闻媒体心目中的华人形象。

笔者粗略翻阅了威尔士南部的一份报刊《西部邮报》(Western mail) ——它是地方报纸, 主要报道当地新闻——从中可以窥见当地舆论界视野中的华人形象。在涉及华人的新闻中, 绝大多数是关于华人的所谓“犯法”事件的报导。似乎“众所周知”的是华人爱赌博, 而赌博在英国是犯法的。早在 1906 年 3 月, 在利物浦就有 5 个华人被指控非法赌博。1925 年 11 月 17 日, 《西部邮报》报导称, 卡迪夫警察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抓获不少参与赌博的华人, 收缴赌款赌具 [一种典型的东方游戏 (Peek a-boo)], 还搜查到 6 盒骨牌、纸牌和其他中国游戏牌。25 日报导说, 那日警察进去时, 没有证据能证明在进行赌博。有人说他们不是赌博, 而是在玩小钱 (2 便士) 找乐子, 但仍被判罪, 房东以开设赌房被罚 25 镑, 其他人分别被罚款 5- 25 镑不等。1926 年 4 月 5

日，则记述了在一次英国华人聚会期间，当华人玩牌时遭到搜查，声称他们犯了赌博罪。1934年4月24日报导说，卡迪夫警察又突击搜查一间华人开设的赌场，抓获数人，他们分别被罚款1-5镑。在70年代登在《南威尔士回声报》(South Wales Echo)的一组回忆早期移民生活的文章中，谈到两种游戏 Pakapu 和 Fan tan，据说，它们是类似于扑克和骰子的游戏。

抽鸦片则是又一恶习。《南威尔士日报》于1909年刊出《卡迪夫的鸦片》一文，宣称，“贩卖鸦片在中国犯法当诛——(而)非法的鸦片买卖却正在(英国)进行。”1929年1月11日的《西部邮报》著文说，在伦敦至卡迪夫的火车上，抓获一个名叫阿曙(Ah Chow)的烟贩，搜查得到13包鸦片，最后法庭宣判阿曙服6个月苦役，服刑期满后驱逐出境。《南威尔士回声报》(1929年9月19日，21日和24日)则回忆卡迪夫布特街(Bute Street)华人寄宿公寓内的鸦片屋情形：四周放置双层床，房中央置一小桌，上有灯火和几支烟枪，桌旁一人负责装烟和点燃，烟客则躺在床上，吞云吐雾。这类房子据说是兼营赌博和鸦片。新闻界把华人吸食鸦片视为种族低劣的证明。不过奇怪的是，连英国史学家也没能找到华人因吸鸦片而上瘾的报导或报告。1906年利物浦警方报告说，他们从未在街头发现因吸鸦片而获罪的华人，也从未引发什么犯罪行为。

所谓的“道德败坏”问题。如果说抽鸦片、爱赌博仅是显示华人“种族低劣”的话，那么，与英国女性的交往问题则涉及到英国人种的高贵和纯洁问题，因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大多数华人只身旅居海外，构成清一色的单身男性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无可避免地会与白人女性接触乃至结婚，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新闻媒体和大众最大的不安，道德家们群起捍卫白人种族的纯洁。不过，正如1910-1911年伦敦的一份调查称，白人妇女与华人通婚一事，无论从英国人的观点看来多么的不受欢迎，令人生厌，但却并未犯法。

1929年1月10日的《西部邮报》发表题为《卡迪夫的溃疡：白人妇女在堕落、罪恶的渊藪、警方为何不行动?》的文章，声称虽然关于有色人种与白人妇女关系的报导很多，但迄今为止无官方行动。指责警方不力，没有出面阻止不同人种之间的姘居和通婚。23日的《卡迪夫的瘟疫》一文，则建议成立“守望委员会”(Watch Committee)，呼吁阻止有色人种雇用白人女性做工，要求遣返有色人种，不准在此定居。同时，中国人的早婚习惯也授人以口实，报界关注的另一面，就是涉及一些未成年白人女子与华人的婚姻或姘居关系。

然而稍稍涉略一下当时警察的有关报告，我们也发现了华人在英国人视界中的一些优秀品质。华人大多遵纪守法，很少给警察找麻烦。例如在1906年，利物浦警察报告说，华人很平和，遵纪守法，很少惹事生非。后来又说，尽管华人常被调查，但并无根据证明他们的道德比周围的居民更糟糕。相反他们大多平和、勤劳。<sup>[10]</sup>因此，华人并未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几乎所有的报告都没有谈到华人聚居区的英国居民对华人有什么敌意。至于与白人女子的关系问题，利物浦警长于1906年向内政部(Home Office)报告说，华人乐于娶英国女子为妻、姘居或嫖宿，但无论在哪种关系中，华人对英国女子都很好，他们严肃理智，不打妻子，对妓女也很大方。更有人说，华人与英国女子相识后，倾向于娶为妻室，而非诱之卖淫。而在卡迪夫，白人女子这样描写华人：他们(华人)待她们(英国女子)不错，华人很能体谅人，非常勤勉。<sup>[11]</sup>据说有位白人妇女，先后嫁给爱尔兰人和华人，第二次寡居后，仍愿再嫁华人为妻。事实上，无论道德家们如何反对、何等不情愿，华人与白人女子通婚现象依然存在。

而在一般民众，尤其是与华人移民朝夕相处的英国人中，对华人也无非议。大体而言，华人移民与英国人和睦相处，邻里间维持着一种真诚亲切的关系。英国人并没有发现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华人是“令人不愉快的”。<sup>[12]</sup>据说在利物浦的皮特街(Pitt Street)——华人聚居区就以秩序良好而出名，在此妇女可不受骚扰安然行路。<sup>[13]</sup>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关于华人涉及鸦片、赌博越来越多的时候，英国大众对华人的态度大变。赌博及吸鸦片，这确是华人的致命弱点，但英国人大概忘了，正是英国商人把鸦片大批倾销入中华大地，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心智，据说“鸦片

使中国人身体衰弱，易于患结核病”。而赌博（常常被当作华人种族低劣的表现）固然是华人无可讳言的恶习，不过从上文几次报导来看，似乎大多是无害的游戏，华人闲暇娱乐，并非真正的赌博，诚如治安推事所说，“这些外国人只是在做一些在他们自己国家里许可的事……很可惜，当局不能视而不见”。<sup>[14]</sup>有时连警方都认为这些不过是（英国人）的想象，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sup>[15]</sup>难怪有人认为，卡迪夫警方把征收所谓“赌博”的罚款作为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手段了。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媒体大多以夸张的笔法，渲染铺陈所谓华人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将华人与鸦片、赌博联系在一起，以偏盖全，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至于混血婚姻问题，那更是带有白人种族主义色彩的谬见。

### 三

新闻媒体热衷于报导有关华人的“新闻”，巧妙地把华人与鸦片和赌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利用混血婚姻问题大做文章，与民众的印象和警察的报告出入不小，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缘于白种人对黄种人的种族优越感，正如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的那样，“在种族方面，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信仰。……在白种人之间人们都相信白种人天生就比其他有色人种都更优秀”。<sup>[16]</sup>正是这种种族优越感，使英国人带着有色眼镜俯视华人，不能容忍华人异样的生活方式。尽管白种人怀着“打仗、赚钱、传教”的动机来到中国，“欧洲商人寻求租界、垄断、铁路、矿权，而且致力于用炮舰维护他们的索取”，<sup>[17]</sup>在华巧取豪夺，但却无法容忍华人在英国分取杯羹，尤其不能容忍白人女子下嫁华人，玷污白种人高贵的血统和种族。无怪乎华人与英国女子的婚姻被视为卡迪夫的“溃疡”和“瘟疫”，引起卡迪夫上流社会及道德家的一片鼓噪。

其次是所谓华人与白人争夺工作机会问题。本世纪初，威尔士与全英国一样，关于华人廉价劳动力问题，于1905-1906年的大选中见诸报端。自由党与保守党就此相互攻击，人们责备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保守党政府签署了一份“辫子保证书”，要“输入”大批华工到非洲德兰士瓦去。原来，自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急于重建南非，恢复金矿生产，于是在190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劳工章程》，为德兰士瓦招募5万多名华工。<sup>[18]</sup>对此，自由党坚决反对，声称这是对英国工人工作的威胁。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们，固然对华工的工作处境深表同情，但更多的人看到的则是这会对英国工人构成竞争和威胁。

在1906年1月的竞选演说中，威廉·布罗斯（William Brace）强调他反对在南非使用契约华工，他甚至于冠冕堂皇地说，这是一种奴隶制。同年1月11日的《南威尔士每日新闻》（South Wales Daily News）发表题为《苦力的丑闻》的社论，和一篇《丑陋的中国奴隶制度》的报道，揭露自由党的伪善，它们问道，为什么白人实际上欢迎苦力，但却加以否认呢？《西部邮报》则压根儿否认奴隶制这个话题，谴责激进分子“十足的言过其实”，洒下的是“鳄鱼的眼泪”。他们宣称：自由党全然无视，如果没有中国劳工，那么南非金矿又将发生什么事！况且，无论如何英国工人不愿在南非那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由此可见，与其说他们在讨论华人问题，不如说是保守党与自由党的一种党派之争，他们绝非真正关心华人，而只是把华工问题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不过，自由党人的主张多少更冠冕堂皇一些，更富于欺骗性一些，而保守党说法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穷于应付，难以自圆其说。

毫无疑问，这场争论使英国大众对华人普遍产生了不良印象，沃尔斯于1908年评论道，“任何注意1906年大选的人大概早就注意到，大肆喧嚷的华工问题，在选民中立即激起了对蒙古人种（指华人——译者注）的憎恨。”<sup>[19]</sup>由于华人毕竟“抢夺”了英国工人的饭碗（尽管事实上英国工人根本不可能到南非去工作），因之在英国人心目中留下恶劣的印象。另外，无论是《西部邮报》和《南威尔士每日新闻》都没有涉及威尔士当地华人本身。大概要到1906年后，有关当

地华人的报导才开始出现在报刊上。

在1911年和1919年罢工事件中，华人成为当地海员和工人的攻击对象。1911年卡迪夫海员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但不久就因船主雇用廉价水手而倍感苦恼——华人是唯一没有参与罢工的海员，成为“罢工破坏者”，因而引起海员工人们的强烈愤慨、谴责乃至攻击。罢工领导者塔伯（Tupper）率罢工工人们经营的洗衣店和寄宿公寓，并捣毁30多家洗衣店，许多华人因此受伤。但后来塔伯声称他接到许多来信（其中有不少是教会来的）为他的行为祝福。<sup>[20]</sup>也正是在这次罢工中，有关将输入大批华工、破坏罢工的谣言一时四起，海员公会的领导人希望借此唤起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尽管海员公会的反华工宣传没有得到其他行业多大的支持（只得到口头支持），但却有助于勾勒出华工对英国劳工的威胁性质。<sup>[21]</sup>在议会里，议员、海员公会主席威尔逊（James Havelock Wilson）宣扬反对雇用华人，寻求每一个机会阻止雇用华工。<sup>[22]</sup>

看起来很明显，英国新闻媒体大肆喧哗的华人问题，其根本在于对工作的竞争，正如塔伯曾说过的那样，“我们不需要鲜血，我们要的是华人在这条船上的职位。”<sup>[23]</sup>有一幅漫画颇能说明问题：约翰牛（John Bull，指英国人）紧紧抓住悬崖上的杂草，一个注明为外国水手的怪物，头发乱七八糟，紧紧地抓着他，约翰牛声称，“我如果不把这个家伙踢下去，我就完了”，<sup>[24]</sup>夸张地描述了在不景气的劳动市场上的激烈竞争。1910年8月13日的《南威尔士每日新闻》说：“在成千上万的国人失业时，输入那么多的华人，这实在是文明的耻辱”。1911年的《卡迪夫海员评论》抨击政府的移民政策过于宽大，特别在香港，华人只要说：“Me Hong Kong”就可获得英国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批英国人投身战争，交战国水手离去，英国劳动力顿时缺乏。在1914年对德国宣战后48小时内，就有9000名在英国商船上服务的敌国水手离开，从1915-1916年起，船主们为获取足够的水手，竞相提高工资，例如，1914年在远洋商船上服务的有色人种水手月工资为5镑10先令，1916年为9镑，1918年则达到14镑10先令。<sup>[25]</sup>因此，尽管海员公会竭力反对，还是有不少华人海员受聘，尤其在一些东方贸易中，雇佣华人更多。

一战结束后，随着大批战士复员，外籍海员就被看作是英国海员的直接竞争对手。尤其是煤炭业的衰落，更使主要作为煤炭出口港的卡迪夫对外贸易萎缩，商船数量锐减，麇集起大批失业大军。1919年7月，卡迪夫有2000名注册的失业工人，其中，1378人是退伍军人，也有1000多名有色海员失业。<sup>[26]</sup>无论在战时和战后，卡迪夫的海员公会一直不停地攻击华人劳工，坚持白人较有色人种有优先受雇权。1919年2月，聚集在卡迪夫的海员们拒绝在任何一艘雇用华工的船上工作。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作出巨大贡献，但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又一次掀起反对华人的浪潮，不少人被迫回国，更多的则被强制遣返。极少数留下来的人离开威尔士。

然而有资料表明，在这些事件中，华人其实不过是替罪羊。当时的华人数量极少，在海员中，华人海员只占2%，<sup>[27]</sup>不可能给英国海员工人就业造成多大的威胁。1910年的卡迪夫有32家华人经营的洗衣店，雇用55个华人，4家有执照的寄宿公寓，住着98个海员，无法与英国工人竞争。那么，是什么使英国人对华工如此愤慨，硬要指责华人与英国工人争夺工作机会呢？

众所周知，英国从18、19世纪以来，由于率先进行工业革命，靠凭借其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横行世界，剥削世界人民，从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日益走向衰落，产品竞争力下降，经济形势恶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更使英国经济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工人失业现象严重，罢工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因此华人便被当作替罪羊，成为英国社会矛盾和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这样，夹杂着种族偏见和失业威胁的英国人民大众，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华人，而新闻媒体则以文明人的倨傲口吻，乘机渲染华人的种种恶习，败坏华人形象，由此把华人移民变成英国社会一个所谓的“问题”。

结果，华人首先被迫从航海业中撤出，后来又被迫从洗衣业中抽身（这一则是由于英国洗衣店的竞争，二则是由于洗衣机的发明，使华人的手洗洗衣店失去竞争力），终于离开了被视为

“英国人的职业”，不再与英国人抢饭碗、争机会，被迫改行经营中餐饮食业，也开辟了华人在英国的第三个职业领域。

## 结 语

总起来看，从新闻媒体对威尔士华人情况的描述来看，本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对华人的态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战前，由于在英国的华人尚少，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大肆宣扬的“黄祸”并没有对英国大众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华人居住相对集中，主要在伦敦、利物浦和卡迪夫等港口城市；其职业主要集中于航海和洗衣业，没有对英国人的生活构成多大的威胁，所以对华人的攻击侧重于其生活方式，只有在卡迪夫，因华人成为“罢工破坏者”而遭到愤怒的海员们的攻击。从一战到 50 年代为第二阶段，这时由于英国本身衰落，经济不景气，深受失业的困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在有些英国人看来，华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此华工遂成为朝野攻击的对象，虽然也有关于鸦片赌博等报导，但更多地宣扬华人对工作机会的竞争问题，实际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的夹杂着种族偏见的一种心理渲泄。

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发现，英国人具有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当英国身处战争状态，人力资源紧缺时，就大量引进华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为英国服务；当战争结束，或经济不景气时，华人又成为“多余的人”和“工作竞争者”，要加以驱逐。因此从华工在英国的遭遇来看，他们得到的不是宽容和感激，而是过河拆桥、种族歧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了他们对华人的种族偏见，媒体上存在着对华人的妖魔化倾向。

### [参考文献]

- [ 1 ] 它由一位退休的远洋船长 W. R. Ward 编辑，以憎恨华人为特色。
- [ 2 ] 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 年 8 月 23 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自 1834 年 4 月 22 日起实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 2 卷第 641 页。
- [ 3 ]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181.
- [ 4 ] Ocean Fleets LTD. Chinese Seamen. Bushstrokes: A Collection of British Chinese Writing & Drawing. Liverpool: Nov. 1996. P4- 5.
- [ 5 ] 聂宝璋.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一辑, 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16.
- [ 6 ] 这里的数字也包括了经英国去欧洲其它国家港口的海员。
- [ 7 ] 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11, Preliminary Report, Vol. IX P224.
- [ 8 ] Jack Ashore: Seamen in Cardiff Before 1914, Welsh History Review, Vol. 9, 1978- 1979, P178.
- [ 9 ] [12] [13] Irene Loh Lyn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Liverpool: Their Unmet Need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and Housing. Merseyside Area Profile Group.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1982. P14, P10, 120.
- [10] [11] [14] J. P. May.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60- 1914, in Colin Holmes (ed.),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P119, P118.
- [15] Nell Evans. Regulating the Reserve Army: Arabs, Black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ardiff, 1919- 45, in K. Lunn. Race and Labor in Twentie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92. P72.
- [16] [17] [英] 罗素, 胡品清. 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108, 16.
- [18] 王荣棠. 英国近代史纲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423.
- [19] G.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London, 1908, P107.
- [20] [23] South Wales Daily News, 1911- 07- 12.
- [21] Jack Ashore: Seamen in Cardiff Before 1914, The Welsh History Review, 1978- 1979, Vol. 9, 194.
- [22] J. P. May,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60- 1914, in Colin Holmes,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1978, P 116.
- [24] [25] [26] Nell Evans, The South Wales Race Riots of 1919, Llafur, Vol. 3, No. 1, 1980 Spring. P7, P9, P12.
- [27] South Wales Daily News, 1910- 09- 21; 1911- 04- 21.